

Linking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

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

edited by Tiziana Lippiello, Chen Yuehong 陈跃红 and Maddalena Barenghi

论“底”来源于“者”

On the Derivation of ‘di’ 底 from ‘zhe’ 者

Yang Rongxiang 杨荣祥

(Peking University, China)

Abstract In Chinese linguistic circles,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whether the predecessor of the structure auxiliary ‘*di*’底 (‘*de*’ 的) is ‘*zhe*’ 者.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the decline of ‘*zhe*’, and discusse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‘*zhe*’ and ‘*di* (de)’ and the overlap between the time of the decline of ‘*zhe*’ and the rise of ‘*di* (de)’; as well as the pho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‘*zhe*’ and ‘*di* (de)’. Lastly, the paper discusses our belief that ‘*di* (de)’ is the new written form evolved from ‘*zhe*’.

Summary 1“者”的衰落过程。- 2“者”与“底(的)”的功能对应。- 3“底”是“者”的口语音书写形式。- 4 四 结语。- 5 参考文献。

Keywords ‘*di*’ (‘*de*’). ‘*zhe*’. Grammar. Phonetic. Structure auxiliary.

现代汉语使用频率极高的结构助词“的”的早期的文字书写形式是“底”，这是很清楚的事实，“底”的前身是什么？是怎么产生的？这是汉语语法史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。关于“底(的)”的来源，很多学者认为来源于“者”，但一直有不同意见，我们认为“底(的)”确实来源于“者”。关于“底(的)”与“者”的关系以及“底(的)”的功能扩展，前辈时贤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（见冯春田1991、2000；曹广顺1995；江蓝生1999；蒋绍愚2005；刘敏芝2008等），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是：（1）上古汉语使用频率极高的“者”经历了怎样的衰落过程？

（2）“者”的衰落是否与“底(的)”的兴起有关？二者在语法功能上具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？（3）“者”与“底(的)”到底是词汇兴替关系还是音变源流关系？

1 “者”的衰落过程

汉语语法史的研究，人们比较多的关心新的语法成分、新的语法结构形式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，而对旧有的语法成分、语法结构形式的衰落及其衰落过程关注得比较少。其实，语法的演变，就是不断地有旧质要素衰落、消亡，新质要素产生、发展，只关心新质要素的形成，不探讨旧质要素衰落、消亡的过程和原因，这对语法史的研究来说是不全面的。

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《近代汉语虚词系统研究》（编号：12JJD740011）的研究成果。

Sinica venetiana 3

DOI 10.14277/6969-095-2/SV-3-23

ISBN [ebook] 978-88-6969-095-2 | ISBN [print] 978-88-6969-098-3 | © 2016

367

众所周知，语法具有很强的系统性，旧质要素的消亡，语法系统中往往会出现新的代偿形式，新旧形式不一定完全等价，也不一定是一对一的关系（参见杨荣祥2011）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描写、分析旧质要素的衰落过程及其原因，有利于我们对新的语法成分和语法结构形式的产生、发展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。

上古汉语十分常见的“者”到晚唐五代时急剧衰落，而这时正是“底”兴起的时候，这自然很容易让人想到，“底”的兴起与“者”的衰落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。

先看“者”的衰落过程。单从使用频率来看，从东汉开始“者”的使用就在不断减少。据刘一豪（2012），“者”战国时期使用频率最高，以每千字出现次数计，《孟子》13.7次，《庄子》17.6次，《荀子》17.9次，《韩非子》15.7次，《吕氏春秋》12.7次。到西汉《史记》降至8.3次，东汉的《论衡》比《史记》多，有8.7次¹。到六朝时期，中土文献如《三国志》每千字只有4.1次，《世说新语》每千字只有2.7次；汉译佛经使用频率还比较高，那有其特殊的原因（参见刘一豪2012）。唐五代的敦煌变文（限《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（唐五代卷）》所收约10万字）每千字1.9次，《北齐书》每千字2次，《祖堂集》每千字2.9次²。宋元时期，《三朝北盟汇编》每千字2.2次³，宋元话本每千字则只有0.4次。明代《金瓶梅》中，每千字“者”不到0.3次，至此，“者”在实际口语中可能除了作为构词语素外，就不再使用了。

“者”在使用频率不断降低的同时，功能却有所扩展。春秋战国时期，“者”的功能是表示指称：用在谓词性成分（动词及动词性结构、形容词及形容词性结构）之后，一般表转指，指称施事（或当事），少数情况下表自指；用在名词性成分之后，表自指（见朱德熙，1983）。但是从西汉开始，“者”陆续产生了一些新的功能：

1. 用在动词之后，提取动作的受事。如：五月，懿公游于申池，二人浴，戏。职曰：“断足子！”戎曰：“夺妻者！”二人俱病此言，乃怨。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，p. 1496）
诸侯更强，时蕃异记，无可录者。（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，p. 1347）

“夺妻者”指“妻被人夺走的人”；“可录者”指“可录之事”（与“可”的出现有关）。这种用法先秦已见端倪，但仅见一例：

及吴师至，拘者道之以伐武城。（《左传·哀公八年》，p. 1648）⁴

“者”的这种用法后来得到了发展，如：

1 按，“者”在《论衡》中的使用频率比《史记》高，是因为《论衡》中有一些近似词化的“X者”和特殊的“X者”，如“论者”（46次）、“使者”（16次）、“当道者”（9次）、“实者”（16次）、“说（……）者”（34次）、“古者”（16次）、“帝者”（6次）、“儒者”（74次）、“王者”（68次）等，如果去除这些特殊的用法，《论衡》中“者”的使用频率要比《史记》低一些，约每千字7.6次。

2 按，其中有些高频率的“X者”，如“侍者”100次，行者59次，“来者”12次，“智者”23次等。如果去除这些用法，《祖堂集》中“者”的使用频率也只有每千字2.2次左右。

3 刘一豪文只统计了《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（宋代卷）》收录部分的约5.5万字。按，其中大部分“者”都出现在叙述性语言中，当是受文言文的影响。

4 《孟子》中有“治於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於人。”（《滕文公上》）“治於人”因为本已用为受动，所以“者”只能提取受事。

于是至诸屯邸，检校诸顾、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，悉以事言上，罪者甚众。陆抗时为江陵都督，故下请孙皓，然后得释。（《世说新语·政事》，p. 102）

后鬼恒在家，家须用者，鬼与之。（《幽明录》卷四，引自《太平广记》320卷，p. 2539）

能问童子：“适才诵者，是何言偈？”（慧能《坛经》，p. 15）

相公问曰：“是何经题？”远公对曰：“夜昨念者，是大涅槃经。”（《敦煌变文·庐山远公话》，p. 259）

融曰：“我依《法华经》开示悟入，某甲为修道。”四祖曰：“开者开何人？悟者悟何物？”融无对。（《祖堂集·卷三》，p. 82）

2. “动+者”用在名词前作定语。这种用法传世文献最先见于《史记》，是“者”的功能扩展的重要一步。如（据吕叔湘、曹广顺等引）：

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，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。（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，p. 2484）

项王怒，将诛定殷者将吏。（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，p. 2053）

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蹙者美人头。（《史记·平原君虞卿列传》，p. 2366）

孝文帝尝梦欲上天不能，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[……]觉而之渐台，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。（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，p. 3192）

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？（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，p. 2533）

据孟美菊、王建民（2002）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中有如下用例：

牡痔居窍旁，大者如枣，小者如枣核者方。

牡痔之居窍廉，大如枣核，时痒时痛者方。

此外，俞理明（2001）在《太平经》中也发现了不少“动+者”作定语的用例：

一日而治愈者方，使天神治之；二日而治愈者方，使地神治之；三日而治愈者方，使人鬼治之。（《太平经·卷五十》p. 234）

地善，则居地上者人民好善。（《太平经·卷四十》p. 169）

行，为子道学而得大官者决意。（《太平经·卷九十八》p. 400）

以上这些充当定语的“动+者”，“者”都是提取动作的施事，到了六朝时期，出现了“者”提取受事的“动+者”作定语的情况。如⁵：

是三千大千世界如树，动之者佛，先度者果熟，未度者果生。（姚秦译经《大智度论》）

时净饭王为王太子，造三时殿……拟冬坐者殿一向暖，拟夏坐者殿一向凉，拟于春秋二时坐者，其殿调适，温和处平，不寒不热。（《佛本行集经》）

5 以下二例据刘一豪（2012）引。

无论是“者”提取施事还是提取受事，“动+者”都和后面的名词所指相同，据此可以说“动+者”都是“同位性”定语。但换个角度看，这些“者”都可以换成文言中的“之”，似乎只是起着连接限定语和中心语的作用。

这种“者”到唐五代时期更为多见。如：

奉敕，辄到者官人解现任，凡人决一顿乃至。（张鷟《朝野金载》卷三，p. 71）

（蒋）恒总追集男女三百余人，就中唤与老婆语者一人出，余并放散。（张鷟《朝野金载》卷四，p. 102）

公既去，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：“问去者处士第几？住何处？”（杜光庭《虬髯客传》p. 2）

当时宝塔新修日，此会终无见者人。（释圆鉴《十偈辞》）

其大王见佛化为千体相，宜悟（疑悞）问言大臣曰：“那个是前来者一躯佛，交朕如何认得？”……又云：“五百生前耶输陀罗合知先来者佛。”……其臣又奏请：“罗睺之子合知先来者佛。”（《敦煌变文·悉达太子修道因缘》p. 474）

左右曰：“启将军，西边是掳来者贱奴念经声。”（《敦煌变文·庐山远公话》p. 257）

你前时耍者玉，自家甚是用心，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。（《云麓漫钞·卷十五》p. 265）

前五例“者”提取施事，后二例“者”提取受事。

3. “者”用在名词性成分后表示转指。这种用法先秦已见，但用例很少，且名词性成分限于“形+名”或表方位的短语。如：

楚子享公于新台，使长鬣者相。（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p. 1289）

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，与人有痔病者，不可以适河。（《庄子·人间世》p. 97）

西北方之下者，则泆阳处之。（《庄子·达生》p. 351）

两汉以后，这种用法的“者”增多。

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。（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p. 2629）

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，乃所谓九州也。於是有所裨海环之，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，如一区中者，乃为一州。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p. 2344）

魏武有一妓，声最清高，而情性酷恶。欲杀则爱才，欲置则不堪。于是选百人，一时俱教。少时，还有一人声及之，便杀恶性者。（《世说新语·忿狷》p. 461）

有菜名曰：“芸薇”，类有三种，紫色者最繁，味辛，其根烂熳，春夏叶，密，秋蕊冬馥，其实若珠，五色，随时而盛，一名“芸芝”。（《拾遗记·卷九》p. 203）

西有崑玉山，其石五色而轻，或似履崑之状，光泽可爱，有类人工。其黑色者为胜，众仙所用焉。（《拾遗记·卷十》p. 231）

而彼仙人寻即取米及胡麻子，口中含嚼，吐著掌中，语小儿言：“我掌中者，似孔雀屎。”（《百喻经·小儿争分别毛喻》p. 169）

我曾所睹，乃为奇特，出过汝今所见者上。[……]我见奇特，出汝者上。（姚秦译经《日耀经》）

寮友问其故，云：“常有妇人来，美丽非凡间者”。（《幽明录》卷四，引自《太平广记》317卷 p. 2509）

南中桐花有深红色者。（段成式《酉阳杂俎续集》卷一0 p. 451）

大设珍馐，多诸异果，甘美鲜香非人间者。（戴孚《广异记·汝阴人》 p. 54）

鲁公曰：“涤烦疗渴，所谓茶也。”赞普曰：“我此亦有。”遂命出之，以指曰：“此寿州者，此舒州者，此顾渚者，此蕲门者，此昌明者，此涪湖者。”（李肇《唐国史补》卷下 p. 66）

杨贵妃生于蜀，好食荔枝；南海所生，尤胜蜀者。（李肇《唐国史补》卷上 p. 19）
开成初，余从叔听之镇河中，自洛招致饧者，居于蒲，蒲土因有是饧。其法宁闻传得，博军人窃得十八九，故今奉天亦出轻饧，然而劣于蒲者，不尽其妙焉。（李匡义《资暇集》卷下 p. 23）

季和将发，就食，谓三娘子曰：“适会某自有烧饼，请撤去主人者，留待他宾。”即取己者食之。（薛渔思《河东记》，引自《太平广记》286卷 p. 2280）

休祐以己手板托言他人者。（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 p. 179）

禄山曰：“某贼人也，不幸两足皆有，比将军者色黑而加大，竟不知其何祥也。”（郑紫《开天传信记》，引自《太平广记》222卷 p. 1703）

太宗骇而问之，伏迥曰：“只为官木橦贵，所以百姓者贱。”（刘肃《大唐新语》卷九 p. 146）

麦地占他家，竹园皆我者。（《寒山诗·贤士不贪婪》 p. 255）

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，“名+者”表转指的“名”从六朝开始范围逐渐扩大，出现了简单的名词和代词，如“凡间、人间、主人、将军、百姓、他人”，还有单音节的地名、代词。

文言与白话分道扬镳从东汉开始就比较明显，六朝后加剧。进入唐代后，文言虚词在实际口语中逐渐消失。为什么“者”到晚唐五代还会保有一定的使用频率呢？我们认为，一方面，今传白话文献并非纯粹的口语，总会夹杂一定数量的文言成分；另一方面，“者”在随着文言衰落的过程中，产生了上述种种新的功能。总的使用频率的消减与文言的命运一致，而新功能的产生，则给了“者”不灭并获得“新生”的可能。

2 “者”与“底（的）”的功能对应

结构助词“底（的）”产生于唐五代时期。已有研究成果提到的“底（的）”的最早用例有：

周静乐县主，河内王懿宗妹。懿妹短丑，武氏最长，时号大哥。县主与则天并马行，命元一咏。曰：“马带桃花锦，裙衔绿草罗。定知帏帽底，仪容似大哥。”则天大笑，县主极惭。（张鷟《朝野僉载》卷四，引自《太平广记》254卷， p. 1979）

崔湜之为中书令，河东公张嘉贞为舍人，湜轻之，常呼为“张底”。后曾商量数事，意皆出人右，湜惊美久之，谓同官曰：“知无？张底乃我辈一般人，此终是其坐处。”湜死十余载，河东公竟为中书焉。（刘餗《隋唐嘉话》下，谈刻初印本《太平广记》引作《国史纂异》， p. 49）

这两例都见于后人辑录的《太平广记》，不是同时资料，且前一例“帟帽底”也可能是“帟帽底下”，“底”是方位词（见冯春田2003，p. 425）。

接下来是敦煌变文和《祖堂集》中的例子。曹广顺（1986；1995）、梅祖麟（1988）、吴福祥（1996）、冯春田（2000）等已有调查分析。诸位学者在分析早期的“底”的用法时，都会拿吕叔湘（1943）列出的现代汉语中“的”出现的六种格式做对比。刘敏芝（2008）曾拿敦煌变文和《祖堂集》中的“底”对照六种格式进行了统计，转录如下：

	敦煌变文	祖堂集
N+底	3	17
N+底+N	0	5
A+底	0	9
A+底+N	1	6
VP+底	3	40
VP+底+N	VP底O	27
	VP底S	89
		10
合计	15	203

据此，到《祖堂集》中，“底”已经全部具有六种格式，而这六种格式，此前的“者”也都具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底”的六种格式与“者”的用法，在出现时间的先后和使用数量上具有相当整齐的对应关系。

先看“者”出现得最多的典型用法“VP者”和“A者”。在敦煌变文和《祖堂集》中，相应的“VP底”“A底”出现得并不太多，这是因为“者”的典型用法在这个时期依然保持其惯性，书写者对这种自古沿袭而来的用法会感到更加自然和习惯。或许口语中说的是“VP+X”、“A+X”，书写时如果偏重书面学来的用法和习惯，就写成了“VP者”、“A者”，如果偏重实际语言的记录，就可能写成“VP底”、“A底”。如《祖堂集》中，据刘一豪（2012）统计，“VP者”有382例，“A者”有83例。所以晚唐五代的文献中“VP底”和“A底”还远比“VP者”、“A者”少。

再看“N+底”、“N+底+N”对应的“N+者”、“N+者+N”。如上一节所述，“N+者”先秦就有少数用例，汉代以后逐渐多见，但N限于“形+名”或表方位的短语，而在敦煌变文和《祖堂集》中的“N+底”，N也主要限于这两类。同时，六朝以后N也有了简单的名词和代词，正好《祖堂集》中“N+底”的N也有少量的简单的名词和代词（参见刘敏芝2008）。如：

国师云：“这个是马师底，仁者作摩生？”（《祖堂集》卷十五，p. 379）

师云：“我不敢瞎却汝底。”（《祖堂集》卷十三，p. 340）

“N+者+N”历代文献中少见，吕叔湘（1943）曾在唐钺的基础上举出几例，但《战国策》一例存在版本问题，《南齐书》一例可作不同的标点（参见刘敏芝2008），剩下

的也就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“儒家者流”、“农家者流”9个很特别的例子，如何训释还值得研究。此外，中古文献中有“所VP+者+N”的用例：

守尸吏暝以为大炷，置卓脐中以为灯，光明达旦，如是积日。后卓故部曲收所烧者灰，并以一棺棺之，葬于郿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董二袁刘传》注引《英雄记》p. 180）

试取上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而长吉者文书，复取中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者书策文，复取下古人所思务行得天意而长自全者文书，宜皆上下流视考之，必与重规合矩无殊也。（《太平经》卷三十七 p. 159）

李德裕作相日，人有献书帖。德裕得之，执玩颇爱其书。卢弘宣时为度支郎中，有善书名。召至，出所获者书帖令观之。（张怀瓘《书断》）

“所VP”虽然不是典型的名词，但毕竟是名词性结构，不过这种用法的“者”文献中很少。与此相对应，“底”产生后，“N+底+N”出现得最晚，《祖堂集》中的用例也最少。如：

师向大王云：“世俗中亦有志人底苗稼，佛法中亦有志人底苗稼。”（《祖堂集》卷十 p. 288）

再看“VP+者+N”和“A+者+N”。前者汉代以后就比较多见了，相应地，“VP+底+N”在晚唐五代用例就比较多。后者文献中极少见，唐钺曾举出《庄子》一例（据吕叔湘1943）：

多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实不入，而机发於踵。是殆见吾善者机也。（《庄子·应帝王》p. 351）

但是这一例很奇怪，《应帝王》篇上下文与“善者机”对应的是“杜德机”、“衡气机”，所以“善者机”未必能看作“A+者+N”。一直到敦煌变文里，才见到一例“A+者+N”，这也就是许多论著中经常提到了例子：

其王崩后，太子二人，大者不恋云花（荣华），山间修道；小者太子丞（承）王宝位，主其天下。（《敦煌变文·悉达太子修道因缘》p. 475）
相应的，“底”产生后，“A+底+N”早期也不多见。

根据上面对“者”的六种格式和“底”的六种格式的对应关系分析，我们发现，除了“VP者”和“VP底”，“A者”和“A底”可能因为文言用法惯性前者多后者少，其他四种格式，基本上是前代或唐五代用“者”的格式多见的，用“底”的格式在唐五代也比较多，如“VP+底+N”、“N+底”，相反，前代或唐五代用“者”的格式少见的，用“底”的格式在唐五代也比较少。这种对应关系应该不是巧合，它说明“底”与“者”之间具有必然联系，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，“底”可能就是“者”的口语读音的新的书写形式。

3 “底”是“者”的口语音书写形式

关于“底”的来源，早先主要有两种观点：吕叔湘（1943）、太田辰夫（1958）倾向于来源于“者”，王力（1958）主张来源于“之”。后来的学者或支持前一种观点，如曹广顺（1986；1995）等，或支持后者的观点，如梅祖麟（1988）。也有提出新观点的，如祝敏彻（1982）、俞光中、植田均（1999）主张既来源于“者”也来源于“之”。冯春田（1990；2000）认为来源于指示代词“底”，江蓝生（1999）认为来源于方位词“底”。许多学者都曾引章炳麟《新方言》中的话，说章认为“底”既来源于“者”也来源于“之”，其实章炳麟只是说白话的“底（的）”相当于文言的“者”和“之”，还相当于文言的句尾“只”⁶。

吕叔湘、太田辰夫倾向“底”来源于“者”，是看重二者功能上的对应关系；王力认为不可能来源于“者”，因为语音上不好解释，功能上也并非完全对应，如“底”后可接中心语；主张双来源者实际上是想调和两种不同的意见，但遇到的困难更大：说部分来源于“者”，仍要解释语音上演变的可能性，说部分来源于“之”，那么来源于“之”的部分是怎么与来源于“者”的部分合流的呢，两个不同的来源语音上会完全一样吗？既然说“底”来源于“者”或“之”都无法得到很好的解释，会不会是别的来源呢？于是有了冯春田和江蓝生提出的新观点。

前辈时贤的研究，对探讨“底”的来源打下了很好的基础，不同意见之间的讨论，也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。我们认为，就像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，“底”来源于“之”，功能上是无法解释的。“底”是一个功能成分，要探讨其所自来的前身，首先必须看二者在功能上是否有对应关系。从本质上说，“之”作为限定语和中心语的连接标志，是一个前附成分，这是由它来源于指示代词（张敏，2003）所决定的；而“底”从其早期用例来看，是一个后附成分。正因为“之”是一个前附成分，所以它不可能出现在“～之”这样的位置，而“底”因为是一个后附成分，所以既能出现在“～底”这样的位置，也能出现在“～底～”这样的位置。而“底”的后附成分的性质与“者”是一致的。

冯、江二位先生提出的观点，虽然既不存在语音演变的解释的问题，也不需要解释结构助词“底”与其前身的功能对应不对应的问题，但是，由指示代词“底”或方位词“底”演变为结构助词“底”的过程并不清楚，缺乏足够的语言实例的支持。我们知道，语法化理论提出了许多语法化原则（参见沈家煊1994），其中包括频率原则、渐变原则、保持原则，而说结构助词“底”由指示代词或方位词演变而来，都不大符合这几项原则。先看频率原则，指示代词“底”在结构助词“底”形成之前，用例极少，更难见到适宜于其演变为结构助词的语法分布的用例。方位词“底”的频率也不是很高，特别是同样很少见到适宜于其演变为结构助词的语法分布的用例。一个使用频率不高的成分，是不大容易发生语法化的。再看渐变原则，其实与频率原则相关，语法化是一个连续的渐变的过程，一个语言单位由A转变为B，通常可以找到一个中间阶段既有A义（包括功能）又有B义（包括功能），或者说既可以理解为A义又可以理解为B义。然而我们目前并没有发现这种情况。保持原则是

6 章炳麟《新方言》：“今人言底言的，凡有三义：在语中者，的即之字；在语末者，若有所指，如云冷的热的，的即者字（者音同都，与的双声）；若为词之必然，如云我一定要去的，的即只字。”早在元代卢以纬《语助》中就有类似的说法：“（者）或有俗语‘底’（平）字意”（“者”字条），“凡‘之’字多有‘底’（平）字义”（“之”字条）。章、卢并没有讨论“底”的来源问题（参见刘敏芝，2008），只是比较白话与文言，“底（的）”相当于“之”“者”“只”，或“者”“之”相当于白话中的“底（的）”。

说语法化发生后, B还会多少保留A的一些特点(包括意义和功能), 然而我们很难从结构助词“底”的身上看到指示代词或方位词的特点。虽然指示代词和方位词都有可能演变为结构助词, 但是就“底”的形成过程来看, 因为文献提供的实例太少, 目前冯、江二位先生的论证, 其说服力似乎还不太充足⁷。

我们倾向于“底”的来源是“者”, “底”是“者”口语音的新的书写形式。如前文所述, “者”与“底”在功能对应方面不存在问题。以往研究中认为“底”出现之前“者”没有或很少见“N者”(转指), 通过文献调查, “N者”并不少见。这就解释为什么“N底”出现得早而且早期用例也比较多。问题还是“者”和“底”的语音关系如何解释。

吕叔湘对“者”变“底”的语音解释说得不是很肯定: “底是否之、者的音变, 牵涉到古代语音, 难于论证。要是就之和者来比较, 之和底韵母较近, 者和底声调相同, 可能性的大小也差不多。我们现在只从用法方面来考察。”太田辰夫则根本没提“底”与“者”的语音关系。王力先生明确提出, 说“底”来源于“者”语音上解释不通。

我们认为, 由“者”到“底”, 语音上并不是完全解释不通。吴福祥(1996)曾提到, “者”“底”可能都已经轻声化, 轻声化可能导致二者的韵母趋同。这种假设当然可能存在。除此之外, “者”“底”韵母相近甚至趋同并非完全找不到证据。吕叔湘(1985, p. 241)在论证指示代词“底”的来源时曾指出: “阿堵的阿是前缀, 堵是者(这)的异体。‘堵’在《广韵》两见: 一为上声姥韵, 当古切; 一为上声马韵, 章也切, 与‘者’同音。阿堵的堵很可能是后一个音, 后来随着者字音变为底, 就写成阿底, 更后又写成兀底。宋元时代的阿底和兀底就是晋宋时代的阿堵, 宋人早已看到这一点: 朱翌(1097-1167)在《猗觉寮杂记》里说: ‘王衍见钱曰阿堵物。阿堵如言阿底。’元马永卿(?-1136)的《懒真子》也说: ‘古今之语大都相同, 但其字各别耳。古所谓阿堵者, 乃今所谓兀底也。’”(p. 241)“堵”从“者”的声, 《集韵》中“者”有“董五切”又音(吴福祥1996)。“堵”能够音变为“底”, “者”当然也可以音变为“底”。

“董五切”与“当古切”同音, 属姥韵(模上声)。唐五代时的语音系统中(主要是以敦煌资料为依据整理的西北方音), 鱼模韵字与齐韵字(“底”属荠韵, 齐韵上声)是有纠葛的。蒋冀骋、吴福祥(1997)曾引周大璞(1979)、罗常培(1933)、邵荣芬(1963)、周祖谟(1988)等人的研究成果讨论唐五代的韵母系统, 从中可以看出“者”与“底”的语音联系。

《集韵》马韵: “者, 止也切, 《说文》: ‘别事词也。’”姥韵: “者, 董五切, 语辞。”马韵“者”肯定就是上古沿用下来的文言“者”, 姥韵“者”是个什么“语辞”呢? 肯定不是文言“者”, 有可能就是由文言用法经功能扩展变异的口语读音“者”。这样, 如果能够找到唐五代前后模韵与齐韵之间的关系, 也就可以解释“者”“底”之间的语音联系了。

周大璞分敦煌变文用韵得23部, 鱼模部中的鱼韵有时与支微部(包括齐韵)通押(据蒋、吴1997, p. 63), 虽然没有模韵字与齐韵字通押, 但既然是两部通押, 说明二者韵母相去不远。

罗常培(1933)根据对音材料得23摄55韵, 齐韵在e摄e、ye、we三韵, 模韵在u摄u韵, 而鱼韵则一半与脂之支(开)同在i摄i韵, 一半与虞韵、模侯尤(唇音)、脂

7 关于来源于方位词“底”之说的疑点, 蒋冀骋(2005)辩之甚详。

之支(合)同在u摄u韵。根据变文的用韵,鱼模同部,脂之支微齐同部,而二者可以通押,说明根据对音分出的e与i、u三韵之间有某种联系。罗常培在分析鱼韵的读音时说:《切韵》时代的鱼韵应读[io],这个音“读的开唇一点就容易变成[i],读的合唇一点就容易变成[y]。这两个音在吐蕃人耳朵里都是很难辨别的,所以就拿他自己语言中固有的i、u来勉强代替。”据此,则模韵与齐韵分别是清楚的,二者的纠葛是因为押韵系联造成的。但是从罗常培先生的这段话也可以看出,对音受到对译双方语音系统的影响,并不完全能够反映汉语当时的实际音值。既然在对音中鱼韵联系着模韵和脂之支微,脂之支微又与齐韵同部,那么,模韵和齐韵的韵母应该相差不远。

再看敦煌变文的实际用韵,周祖谟(1988)对变文的用韵分析的结果与周大璞大致相同,也是23部,其中之部包括支、脂、之、微、齐几韵系和去声祭韵字,鱼部包括鱼、虞、模三韵系和尤、侯韵系的唇音字。“者”入韵均在“假摄(麻部)”,自然是马韵的“止也切”一读,而在姥韵读“董五切”的语辞“者”没有入韵的。但是,之部和鱼部可以通押,虽然未见齐韵系与模韵系直接通押,但有模韵系的字与之部通押,如“步、土、五、度、怒”等,语辞“者”的反切下字“五”就可以和之部字通押。据此,“董五切”的“者”与“底”的韵母应该是相近的。蒋冀骋(2005)曾论证:“‘底’读te,与‘者’的姥韵在方言中的读音ti非常接近,可替代。”这个论证是值得重视的。

我们推测,“者”在唐代有文白两读,文读依据语音演变规律读“章也切”,白读依据口语音读“董五切”。“董五切”与“底”声母、声调相同,韵母相近,因与“者”的正常语音演变规律不合,书写时就写成了“底”,而文读音则保持着“者”这一书写形式。

因为“者”有文白两读,在白读音写作“底”后,文献中就出现了“者”“底”同现的状况,口语中读“底”的音,书写时则既可写作“者”,也可写作“底”。冯春田(1990)曾列举许多对偶文句、同一文献中同类结构的文句以及不同文献中同类结构的文句中或用“者”或用“底”,据此冯文认为“者”“底”之间只有词汇替换关系,没有源流演变关系。我们注意到,冯文所列例句中,用“者”的都是“VP者”和“AP者”,如前文所说,在“底”的书写形式出现后,“者”仍然保持着其文言用法的惯性,特别是其典型用法“VP者”和“AP者”。完全有可能口语中说的是“底”音,书写时却不自觉地写成了“者”。

四 结语

“底”在晚唐五代逐渐普遍使用后,“者”的衰亡速度加快。“底”不是“者”的替换形式(词汇替换),而是由“者”演变来的新的书写形式。新形式产生后,旧形式没有立即消失,其原因是“者”有文白两读,加上文读的“者”借助文言的强大惯性,使其能够在书面语中得到较长时间的保留。而白读写作“底”后,渐渐与“者”的典型用法分家,功能也逐步扩大,特别是到了宋元之际写作“的”后,不仅具有了文言中“者”的功能,同时兼并了文言“之”“所”的功能(参见蒋绍愚,2005)。这种功能的扩展,使得“底(的)”看起来既与“者”有联系,也与“之”有联系,但从早期“底”的用法看,它最先只是继承了“者”的功能。

语法的新陈代谢,可能是词汇替换,如处置式标记“把”替换“取、将”,事态助词“了”替换“已”,新旧形式各自有自己的演化过程;也可能是传承关系,即新形

式由旧形式演变而来，只是由于书写符号发生变化，书面上写成了不同的汉字，如第二人称代词“尔”变成“你”，语气词“无”变成“吗”。“底”和“者”的关系应该属于后者。

参考文献

- 曹广顺 (1986)。《〈祖堂集〉中的“底(地)”“却(了)”“著”》，《中国语文》3期。
- 曹广顺 (1995)。《近代汉语助词》，语文出版社。
- 冯春田 (2000)。《近代汉语语法研究》，山东教育出版社。
- 冯春田 (1990)。《试论结构助词“底(的)”的一些问题》。《中国语文》6期。
- 江蓝生 (1999)。《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“底”的由来》《中国语文》2期。
- 蒋冀骋 (2005)。《结构助词“底”来源之辨察》。《汉语学报》第一期。
- 蒋冀骋吴福祥 (1997)。《近代汉语纲要》。湖南教育出版社。
- 蒋绍愚 (2005)。《近代汉语研究概要》。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刘敏芝 (2008)。《汉语结构助词‘的’的历史演变研究》。语文出版社。
- 刘一豪 (2012)。《结构助词‘者’的历史演变》。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。
- 罗常培 (1933)。《唐五代西北方音》。《史语所集刊》甲种之十二。
- 吕叔湘 (1943)。论“底”、“地”之辨及“底”字的由来，见《汉语语法论文集》(修订本)，商务印书馆，1984年。
- 吕叔湘著江蓝生补 (1985)。《近代汉语指代词》，学林出版社。
- 梅祖麟 (1988)。词尾“底”、“的”的来源《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0年。
- 孟美菊 王建民 (2002)。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“者”字用法浅析，《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》第2期。
- 沈家煊 (1994)。语法化研究综观，《外语教学与研究》第4期。
- 太田辰夫 (1958)。《中国语历史文法》(修订译本)，蒋绍愚、徐昌华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。
- 王力 (1958)。《汉语史稿》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修订本。
- 魏培泉 (2004)。《汉魏六朝称代词研究》，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(台北)。
- 吴福祥 (1996)。《敦煌变文语法研究》，岳麓书社。
- 杨荣祥 (2011)。上古汉语连动共宾结构的衰落，《中国语言学》第五辑。
- 俞理明 (2001)。《〈太平经〉中的“者”和现代汉语“的”的来源》，《汉语史研究集刊》第四辑，巴蜀书社，2001年。
- 俞理明 (2005)。从东汉以前的文献看“者”介入定中之间的过程，《中国语文》第1期。
- 张敏 (2003)。从类型学上看上古汉语定语标记“之”语法化的来源，吴福祥、洪波主编《语法化与语法研究(一)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- 周祖谟 (1988)。敦煌变文与唐代语音，见《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- 朱德熙 (1983)。《自指和转指——汉语名词化标记“的、者、所、之”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》，《方言》第1期。

引用文献

- 《朝野僉载》。张鷟 (660?-740?)。中华书局1979年。
《大唐新语》。刘肃 (820?)。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。
《广异记》。戴孚。中华书局1992年。
《坛经校释》。郭朋。中华书局1983年。
《敦煌变文校注》。黄征; 张涌泉。中华书局1997年。
《酉阳杂俎校证》。刘传鸿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。
《虬髯客传》。杜光庭 (850-933)。中华书局1991年。
《三国志》。陈寿 (?-297)。中华书局2006年。
《史记》。司马迁 (145BC.- 90BC.?)。中华书局1985年。
《世说新语》。刘义庆 (403-444)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。
《拾遗记》。王嘉 (?-390?)。中华书局1981年。
《隋唐嘉话》。刘餗 (?-742?)。中华书局1979年。
《太平广记》。李昉 (925-996)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。
《太平经》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。
《唐国史补》。李肇 (?-813?)。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。
王孺童。《百喻经释义》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。
项楚。《寒山诗注》。中华书局2000年。
杨伯峻。《春秋左传注》。中华书局2014年。
《云麓漫钞》。赵彦卫 (?-1195)。中华书局1996年。
张美兰。《祖堂集校注》。商务印书馆2009年。
《庄子注疏》。郭象 (?-312)。中华书局2011年。
《资暇集》。李匡义 (?). 商务印书馆1939年。